关于社会资本研究视角的若干思考

贾 鼎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1980年代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之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从各个学科、各个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理论之风。然而,怎样把握社会资本的研究主线,已成为摆在众多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研究视角这一观点切入,尝试在众多的社会资本研究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梳理归纳社会资本研究的脉络,以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能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

[关键词]社会资本;研究视角;现实情境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1&ZD032)

[作者简介]贾 鼎(1984—)男,河北省柏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公众参与与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1-0104-03 [收稿日期]2013-10-12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问题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让·雅各布斯,他认为“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社会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返还。”^{[1] P245}而把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一直把场域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的资源总和,对于个人或组织来说,这种持久的网络由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制度化的默契和认可关系,因而它的积累是自然形成的。”^{[2] P119}布迪厄从资本的初始定义中把资源的概念提炼了出来,并置入社会这一场域中。

继布迪厄之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系统论证。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其功能决定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的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3] P354}。科尔曼强调了两点:首先,科尔曼的定义起点是个人,即“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其次,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即它不是依附于独立的个人,而是依托于个体所在的社会网络,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社会结构资源并非能够被替代。

把“社会资本”概念拓展到社会学领域之外,并引起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各学科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他发现,在一个寄存在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共同体内,资源的合作更容易出现。由此而给出了“社会资本”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 P195}

从上述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研究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贯穿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而且社会资本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又是一个不

断丰富且充满交锋的过程。可以说社会资本研究在这种交锋与交融过程中首先从皮埃尔·布迪厄、让·克鲁德·帕赛龙、格莱恩·洛瑞这里明确下来,接着从詹姆斯·S. 科尔曼、罗纳德·伯特、亚历山德罗·波茨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众多学习者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样复杂的、充满交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中如何去把握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脉络?换句话说,如果能够梳理出清晰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线索,将会是把握社会资本研究脉络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社会资本研究视角探析

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代表性人物很多。笔者在此选取三个学者作为分析对象,以呈现社会资本研究的整体脉络。林南把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定位在个人行为层面,这一点从其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历史基础的回顾即可看出。他认为,在古典资本理论之后出现的新资本理论的实质是结构性约束下的行动。因为“新资本理论偏向于微观层次,解释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劳动者,为了在市场上获得劳动的剩余价值如何进行投资”,而且它还具备一个特征,即“行动或选择已经作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5] P16,17}。在此基础上,林南给出了社会资本的定义: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虽然社会资本理论在原有理论之上扩展了个体化的视角,但这种扩展仍是在一个整体网络或群体中所联系和使用的资源下将个体的选择行为作为研究视角起点的。

林南把个体行动者维持和获取资源的行为划分为两种行动类型: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前者是为了获得自己所没有的资源,后者是为了维持已经拥有的资源。而这些行动的发生基础就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因为“互动代表的不仅是两个行动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行动者占据的两个社会位置的互动。与一个控制更多资源的行动者互动,意味着与一个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位置互动”^{[5] P47}。尽管这种互动带有很大的主动性。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可归纳如下:首先,完成了对于社会资

本的定义。其次提出了研究基础假设:结构假设,即有价值的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互动假设,互动的发生遵循同质原则,资源特征越相似,发生互动付出的努力越小;网络假设,在社会网络中,大多数的资源嵌入在每一个行动者都联系的他人中,或者嵌入在每一个行动者都占据或联系的结构位置中。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始终是以个体行动者为核心进行建构的。其社会资本的定义为个体行动者通过网络或社会关系获取的结构性的嵌入性资源。其社会资本存在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位置(金字塔型等级制)和网络位置(关系强度和桥梁)。个体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中完成了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使用交往者与交往者的资源)。前者给行动者带来了工具性回报,后者带来了情感性回报。

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定位在了社会结构层面,其理论核心体系认为公民共同体即在意大利历史上互助会、合作社和其他公民合作组织促使了制度的成功。社会资本正是在这种信任和网络的互动中所产生的。普特南的研究是从意大利南北之间的制度绩效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展开的。在回答制度差异问题上,他对意大利二十个地区的决策过程和政策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力求在可操作性的标准下给出制度的一个评价平台。当对不同地区制度绩效测量结果最终显现时,作者分析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进入分析视野的是经济因素(其与制度绩效正相关)。当这一假设提出时,反例的出现(在某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政府绩效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要低)无疑显示出在经济发展和政府绩效之间还存在着第三个变量,并且第三个变量的显著程度要高于经济发展变量。这使得普氏把研究导向了制度绩效高的地区的公共生活。他发现,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许多正式社团组织,例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等,这些组织的参与方式都是横向的、水平的。而低绩效地区公共生活中缺乏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更多存在的是垂直的等级制组织。这种组织结构现象的存在,让普特南从回溯意大利中世纪的历史中找到了社团组织的前身即公民共同体。当共同体的概念提出时,普特南的研究视角逐步清晰起来。他指出,从中世纪至今历史的延续性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在制度绩效高的地区这种均衡状态产生的原因正是在共同体或者说是公民网络中所形成的规范,以及在这种规范下由重复性行为所衍生出的信任。虽然一些学者指出普特南的研究是从新制度主义或是从文化和价值的层面完成了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但笔者认为普特南的研究视域是从结构观点所展开的,因为在普特南看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社会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 P195} 其研究逻辑的主线始终围绕在社会资本产生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之中,一直把社会资本视为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

福山认为,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观表象贯穿于低信任社会与高信任社会,从而呈现出社会资本的文化形态。亦即福山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定位在了社会系统的规范和价值领域(文化的视角)。福山首先分析了低信任社会潜在的文化根源。如华人社会中企业集团的规模较小并且以家族化方式发展,究其原因,是华人社会不是靠宪法和法律治理的,而是儒教伦理道德在

每一个人心中内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家庭是社会关系完美化身,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要为其负责。华人社会这种强烈的内部人倾向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于外界的不信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高度的个人主义。而法国社会这种低信任是因法国文化中对这种中间组织所需要的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非常讨厌,相反是更加喜欢明确的、集权的、等级式的权威。“法国官僚体制的组织结构是解决法国人对权威的矛盾态度的最好方案。”^{[6] P119} 而韩国企业规模虽然庞大,可是在表征和行为上所表现出的特质与低信任社会一样,在气势壮观的外表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实质——迟缓而不情愿地接纳专业型管理体制、公共所有权、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客观的、等级式的公司形式。这是因为韩国同样受到儒教影响,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结构文化倾向。

与低信任社会相比,福山对高信任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日本之所以拥有完善的现代化工业结构,并表现出大企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特征,是受很深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的。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源于中国,但在长期衍化和自我适应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与中国的家庭观念不同,日本人家的概念淡化,集中表现为:①日本的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的家庭结构的长子继承制;②非血缘关系的氏族社团组织;③对于儒教精神中“忠诚”的推崇。而德国从19世纪后半叶迅速走出家族式企业模式,迈向专业化管理,其背后也是一种规范在起支撑作用。美国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传统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化管理的过度,表面上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相悖,实则是结社传统在发挥着作用。正是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人的结社文化传统和美国人心中的自由主义情结的共同作用在影响着美国企业。这一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就是社会资本,即福山一直强调的“信任”。

至此,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林南的研究是理性选择法及个人主义方法论一个很好的诠释,它所包含的假设是以个人意图为基础来建构整个社会系统理论,并寻找每一种理论解释的微观基础。嵌入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个体行动者的有目的行动是依据损失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所进行的社会交换活动,这些个体行动者所产生的活动结果最后形成了系统的社会资本。

普特南则是中观结构的研究视角,他认为,“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社群发展上面,为各种社会组织留下存在空间,即使这些组织与政治和经济建设没有什么关系”^{[7] P64}。普特南的研究以公民参与网络为起点,认为网络首先是培养了普遍化互惠惯例,其次是通过网络的协调与沟通,加强了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信任。因为“这些有组织的交流和把公民团结起来的网络不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副现象,而是它的决定因素”^{[8] P83}。

福山的研究则把社会资本作为了一种规范和价值观,即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及价值观构成的。社会资本在这里是一种主观表象,是一个社会系统中人们关于相互关联方式的集体态度,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价值观所具有的特征。“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就是人们将他人视为公民同人,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和敌人。”^{[9] P381} 正如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凝聚力量之一。”^{[10] P326}

上述三位著名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正是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不同层次的典型代表。通过对这三位学者不同研究视角的梳理,可以总结出社会资本研究的三个层级。在微观层面上,林南讨论的是个体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个体出于理性选择动因而产生的有目的行动。在中观的层次上,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的网络,即网络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分配结果。在宏观层面上,福山研究的视角是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这三位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归纳与总结当前社会资本研究的三条线索。第一条是组织线索,第二条是个体行动者线索,第三条是文化、制度线索。社会资本理论也正是在这三条线的支撑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当然,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各个学科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即一条线索或者说一种研究视角下的“假设”看不到另一研究视角下的“范式”,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很大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社会资本研究视角的中国现实情境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同样存在着固有视角,这种视角使我们带上了有色眼镜,无法分辨出中国现实情境下社会资本的真正面貌。这种研究视角简单说来就是家国同构,国即是大国,家就是小国。在这种传统思维下,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问题就会把视角放在国后面的家上。何为家,家就是固定土地上的房屋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人可以四处游走,但落叶终须归根,这片“国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也正是在这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的中国社会组成结构。在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下,中国的社会资本的载体被定义在了家乡、家庭、单位、学校,其中家庭、家乡所体现出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但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入,传统差序格局下社会资本形成中的如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的信用并不是对于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1]正在被一种非血缘结构的、陌生人之间的合同契约所替代。

现实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已经产生。中国最强调的家的概念也就是血缘关系,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现实生存压力、主体价值偏好的影响等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资本不再是嵌入在家缘结构当中,更多的是以交换的形式嵌入在非血缘关系当中。这种交换可以是对等的交换,

也可以是非等价的,只要这种交换能够带来双方的认同。交换的发生是超越家缘结构的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行为,它要求交换双方或多方之间掌握着对交换另一方有利的资源,这种行为已不再是建立在家缘、血缘、亲缘关系之上,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这一交换行为发生的实质是个体行动者在交换过程中依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而谋求自我利益的增加。正是由于行为的改变,使产生行为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像林南行动理论指出的,更多地发生于拥有相似性资源的行动者中间,这种“相似性”不但包括资源的同质性,在异质性资源中相同或相似层级上,这种行为也可频繁地发生。但不同于林南的理论是,这种获取资源的工具性行动不是发生在不同层级之间的跨级互动,而是发生在相同等级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互换行为的发生更多地出现在相同的层级之间,不取决于资源是否相似,而在于资源占据位置上的层级。所以,社会资本已经演变为在相似层级上的资源占据者之间所拥有的一种维系和获取资源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伍考克.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J].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2000.
- [2] Pierre Bourdieu, Loic Wacquant.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3] 詹姆斯·S. 科尔曼. 社会理论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 罗伯特·D. 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 [7] 罗伯特·D. 普特南. 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3).
- [8] 罗伯特·D. 普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 规划师, 2002(8).
- [9] 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0] Goren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oren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Thoughts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JIA D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estern scholars set off a wave of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apital since the French sociologist Pierre Bourdieu proposed “social capital” concept in the 1980s formally. A lot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confused many scholars. So how to grasp the main line of social capital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many scholars. This paper try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select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works to analyze, generalizing the context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 scholars Linnan, Putnam, Fukuyama launched their study re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actors, social network and culture. The author combines Chinese realistic situation, pointing out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onder some useful work.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Perspective; Real-life Situation

[责任编辑、校对: 王月霞]